

## “我是安徽徽州人”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唐]岑参：《逢入京使》

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一个人到了暮年，往往特别怀念桑梓之邦，流露出的情感也最为真挚和执著。

1960年的一天，当秘书离开胡适的卧室时，听到身后在用绩溪方言背诗，好像是“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公元6世纪的南朝人，梁元帝萧绎让他朝聘于北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江南故土。当时，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爱好文学，对才华横溢的庾信恩礼有加。故此，庾信在北朝宦海扬波，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然而，他虽然位至通显，却时常客思凄迷，催梦依依。曾作《哀江南赋》，以抒发其故园之思……

胡适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常对自己晚年的秘书兼助手胡颂平说：

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

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

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

绩溪，徽州，……，尽管暮云断处，迢遥山水，但在胡适心目中，故园仍然令他魂梦牵萦。

早在50年代，胡适就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邀请，作过十数次的口述回忆，简明介绍自己的家世、求学和治学的主要经历以及学术成就，这就是唐德刚教授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

翻开《胡适口述自传》的第一章，映入眼帘的是“故乡和家庭”。其下次一号的字体是“徽州人”三个字。而接下来劈头的一句话便是——“我是安徽徽州人。”

徽州，地处安徽南陲的黄山、白岳（齐云山）之间，北有云烟缭绕的黄山迤迤而去，南有峰峦叠嶂的天目山绵延伸展。如果我们乘着火车经南京、芜湖前往徽州。通过宁国之后，途经绩溪、歙县、休宁、黟县和祁门，一直到江西的景德镇，折而向东的婺源，透过车窗看到的“新安大好山水”——溪山环峙，秀峰叠翠，轻帆斜影，村落绵延，真可谓“黄山白岳相对峙，风景绮丽甲江南”。尤其是点缀其间的粉墙、黛瓦、马头墙之建筑风格，几乎是如出一辙，这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明清时代徽州一府六县民俗的独特内涵。

从地理环境来看，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的时代，徽州就有“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说法。所谓“山限壤隔”，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有过解释，即徽州一府位于“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山地及丘陵占到十分之九，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而“民不染他俗”，则道出了徽州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

徽州的地望，素有“吴楚分源”之说。据说，先秦时期吴楚争雄，此处因地当两国之间，遂有此称。迄今，在徽州西徧的婺源县北浙源乡的浙岭脊上，仍然保存着“吴楚分源”的青石界碑。在东面接壤处，明末金声亦曾指

出：宣州和歙州壤地相接，歙州“地狭民啬”，与饶州相连，风气也与豫章（江西）相近；而宣州人“文采跌宕”，则接近吴越一带的风俗。金声笔下的“宣”、“歙”、“饶”三州，都是唐代的地理概念，歙州后改为徽州。换言之，歙州与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在民俗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从历史行政区划来看，一府六县的范围也大体上比较稳定。从唐代中叶起，歙州领有歙、休宁、黟、婺源、祁门和绩溪六县，此后，除婺源一度上升为州外，一直未曾发生过大的变动。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基本上也就与上述的地域相当。

在历史时期，徽州是家族制度极为盛行的地区之一。自唐宋以来世系清晰的家族比比皆是，这使得徽州的民俗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纵向传承；同时，由于家族的不断分化、迁徙，使得徽州地区的人口不断集约化，这又为民俗在空间上的横向衍播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家族制度下宗族各支派间频繁的联系，更为民俗的交流和同化，创造了机会。清人赵吉士指出：徽州各姓都是聚族而居，风俗最为古朴。宗族成员之间彼此礼让，各姓皆由宗祠统率。每逢岁时伏腊，村中千丁会聚，祭祀采用朱熹的《家礼》，彬彬有礼。当地父老曾说，徽州有着较他处优越的数种风俗：“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年不改，……”《寄园寄所寄》中的这几句话，道出了徽州民俗的主要特征。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对于桑梓乡土有着独特的自豪。歙县有一首谜语这样写道：

二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  
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

谜语中四句的谜底，分别是“徽”、“州”、“朝”、“奉”四个字。“朝奉”一词，至迟在元代的徽州契约文书中就已出现。根据胡适的说法，近数百年来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才逐渐成了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的泛称。

大概早在东晋时代，徽州人就已远贾异乡，奋迹商场了。及至明清，徽商除了经营传统的茶、竹、木、瓷土、生漆等土特产以及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玄笔等“文房四宝”以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等诸多行当，足迹不仅遍及国内的山陬海隅、孤村僻壤，而且还远至海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一等生业，半个天下”，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的木商，祁门的茶商，全都以其巨额的财富和鲜明的地域特征而闻名遐迩。在明清时代，“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随着新安商贾财力的如日中天，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也人文郁起，山川风物为四方所艳羨，徽州文化更呈现出空前辉煌的一瞬。在那一域水土上，孕育出了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新安医学、徽剧、徽菜、徽派盆景和徽派建筑等诸多文化事象及众多的流派，在中华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于是，山水清淑、钟灵毓秀的徽州，也就有了“东南邹鲁”、“文物之邦”的美称。

数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徽州这块土地，但见烟树葱茏，掩映着栉比而立的黛瓦粉墙，将徽州民居衬托在山光水色之中，呈现出一派清新野逸的田园风光。犹如丹青妙笔在用枯笔淡墨，勾勒出疏树寒村的山水胜境。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牵人情思，强烈地吸引着我深入画境，寻幽探胜而陶然忘返……

以下，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徽州移民后裔的足迹，一起踏上返乡的归途，

共同走进数百年前的一个历史片刻……

### 水源木本百世其昌

水有源，木有根，人之于祖亦然。……语云：“歙俗千年归故土。”

——[清]江登云：《橙阳散志》

翻开《岑山渡程氏支谱》残本，上面记载有程氏统宗源流之详细脉络，追寻了全国各地家族成员分迁移徙的点点足迹：

天开地辟，人物生成，厥初生民，未有姓氏。我程之先，系出休父，佐周平夷，周封程土，因以为氏。……

……新安程氏，自篁墩始，四十四派，悉在于此。

程氏位列《新安大族志》之首。据说，该姓出自黄帝重黎之后，自西周大司马休父辅佐宣王中兴，被封为程伯，子孙遂以国为氏。

翻阅《岑山渡程氏支谱》，程氏家族的支脉分叶一目了然。从中可以看出，单单是新安江上游的这一僻野山乡，一个家族的成员就广泛迁徙到了苏州、江宁（今南京）、松江、上海、宜兴、扬州、淮安、海州（今连云港附近）、高邮、安东（今涟水）、阜宁、泰州、杭州以及北京、四川、辽东和广东等数十处。

其实，类似岑山渡程氏这样的宗族不在少数。皖南素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俗谚，说的是——由于山区地狭人稠的生存缺陷，徽州人注定要向外部世界拓展生机。翻开不少明清徽州族谱，都会看到类似的世界系迁徙源流。

徽州的宗族及其分支，犹如汨汨流淌的新安江，由发源的涓涓细流，到激流飞湍的滚滚江水，绵延不绝，源远流长。如果从下游逆流而上，“一滩高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新安在天上”，俗谚亦作“徽州在天上”。倘若我们将地理环境与宗族人文比照而观，那么，新安江下游广大地域及江南各地的许多宗族，其渊源都与“天上”的徽州有关。这正像《新安景物约编》所提到的那样——“山连吴、越云涛涌，水接荆、扬地脉长。”吴越的云涛，荆扬的地脉，都与徽州的山水绵亘相联。这既是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又是人文景观的血脉沟通。对此，胡适曾经说过：

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一样的清楚。

徽州当地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其实，源远流长的徽州大姓，远不止上述这些。从《新安大族志》的记载来看，包括上述十五姓的五十五个大族，在徽州一府六县都有广泛的分布。“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百代祠堂古，千村世族和”，这些，正是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写照。

新安江滋润的这一方水土，孕育着发达的宗族社会。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主流，发源于休宁县，主要由率水、横江和练江汇聚而成。沿着寒碧荡漾的

江水顺流而下，就到了新安土族的发源地篁墩——程氏的祖居地也就在此处。

篁墩位于黄山市屯溪区的东北部，西面背靠海拔二百米左右的丘陵，因地处交通要冲，历史时期，进出徽州的外来移民几乎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比较著名的如，南宋理学家、婺源人朱熹在自序家世时，就毕恭毕敬地书上一笔——“世居歙州歙县黄（篁）墩”。“篁墩”在徽州移民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洪洞“大槐树”之于山西移民、宁化“石壁村”之于客家人，在新安人的“寻根絮语”中，这一地名总是反复地出现。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篁墩亦被视作徽州的泰山，成为禳度求寿的圣地。

根据程氏后裔的追忆，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之际，程元谭起兵镇守新安，遂为当地太守，他被后人尊为新安程氏的始迁祖。大约过了二百余年的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起兵叛乱，裔孙程灵洗又起兵捍卫徽州全境，也成了新安太守。后来，因其保障乡土之功而被神化，官府封其庙为“世忠”，累封为“忠烈王”。据传说，唐末农民起义时篁墩为黄巢部将占据，为了躲避战乱，自东晋以来就世居其地的程氏族人纷纷四散逃命，这也就是程氏后人散居徽州各地的原因之一。不过，篁墩作为新安程氏的始迁地，大概是在兵燹乱后，仍然有一支回到此处居住，后来在这里建有程氏统宗祠（大约毁于50年代末）。当地有位村民告诉我，到1946年，单单是篁墩程氏这一支脉以下就有一百零八派，广泛分布于东起绩溪、西至婺源的原徽州一府六县境内。每年定于4月30日，在程氏统宗祠会谱、祭祖团拜、上墓挂钱。届时，各派无论路途多远都要派人前来，济济一堂，共叙昭穆。通过一年一度的团拜会聚、追宗叙谱，宗族中大大小小的各个支脉，明族属，辨亲疏，不断地强化了这样的一种意念——“子世日繁，皆本一人之身，何分尔我？”“宜兄宜弟，如手如足。我们都是从同一个根系上繁衍出来的，同族是一家。”

如今，篁墩程氏世忠庙早已不存。不过，从程嵩龄编辑的《程氏遗稿四种》所附的新安篁墩程氏祠庙图的照片中，仍然依稀可见昔日的规模。程嵩龄为新安程氏泰州支派的后裔，其先祖虽然在数百年前就已迁居苏北的泰州，但故园在族裔心目中仍然是遥远旧梦的归宿。甚至到1976年3月，旅居海外的程大千（江苏泰县人）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到：

忆余于二十九年（按：即1940年）旅次皖南，曾访谒族曾祖锡荣，由其向导，前往篁墩，展谒程氏统宗祠、世忠庙，参加由溪（在屯溪东十里，俗音牛坑）支派祠堂祀典，并赴黄泥村祭扫先世山峰公祖茔。当时情景，至今犹深印脑际。……追怀先世，弥滋怅惘之情。

途程悠远的故园，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已是梦影迷离，但它在天涯游子的心底深处，仍然是个磨蚀不去的符号。

在一个春雨霏微的季节里，我寻访着潘氏家族的生活足迹。

绕过一段泥泞的徽州巷道，豁然映入眼帘的是潘家祠堂的正门——华轮美奂的五凤楼门厅，雕梁画栋，华美异常，与那些“森严、肃穆”等书上描绘的字眼，似乎都不相干。在我眼里，富丽堂皇的宫阙式门楣，倒像是慈眉善目的潘氏先祖，正温情脉脉地注视着每一位亲情骨肉。或许，这正是宗族社会长期存在的魅力所在？

潘家祠堂位于歙南的北岸镇大阜村，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咸丰兵燹被战火所毁，同治年间重修。潘氏是大阜的名家巨族，据说“其受姓出自毕公荥阳后”。根据族人的讲述，徽州潘氏的始迁祖系唐代的一位刺史，其人原来世家八闽，后为宦新安，因黄巢之乱而无法返乡，只能卜居徽州，子孙

遂散处于新安六邑各处。据《大阜潘氏宗祠记》记载：

新安比户皆珂里也，家礼乐而户诗书，殆世所称“东南邹鲁”也。地踞江南众流之上，东达钱塘，滩高五百。西达彭蠡，亦如之。人谓“新安在万峰中”，不知实在万派上。故人多高风峻节，俗多尊祖敬宗。名家巨族，无不以宗祠为急务者。……

这里所说的新安在“江南众流”的“万派”之上，实际上也是将自然地理与宗族人文相提并论。的确，江南各地的许多潘氏后裔，推其渊源，也都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里。迄至今日，大阜村仍然麇集着世系行辈脉络清晰的潘氏族众，他们会向偶尔到访的好事者，津津乐道地细述着家族先辈中的名人佚事。譬如，苏州有“贵潘”、“富潘”和“野潘”之说，据称，他们都是大阜潘氏的后裔，而清代乾隆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太傅潘世恩，就是“贵潘”的一员。

“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风敦”，潘家祠堂倚山而建，中进大厅的雀替等处，雕有百匹形态各异的骏马，精美异常，俗称“百马图”。穿过幽暗的大厅，最后一进是建在台基上的寝堂。在传统的宗祠建筑中，寝堂台基的高度至少不下三四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殿堂雄伟，非承以较高的基座，不能满足视觉上的凝重感，更无从表达中国人对慎终追远的虔诚。

庙厅与寝堂之间是由阶石组成的两侧踏步连接，狭长的一方天井，兼具采光、通风和排水诸多功能。四面屋顶上的水枳源源不断地将雨水导入天井，而绝不外淌，这是不肯让财源外流的“四水归堂”——作为徽派建筑的一个特色，显然折射出黄山白岳间这个商贾之乡的世俗价值观。而从家族繁衍的角度视之，“四水归堂”还寓意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流长如川之不息。所以徽州人常说：“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

数百年来，大阜潘家有许多人侨寓异处他乡，落地生根。其中，以卜居苏州者为数最多。这些侨寓异乡的徽州人，时常返乡省亲，祭扫祖坟。清光绪九年（1883年）苏州人潘介福作有《癸未省墓日记》，其中，为人们提供了一次徽祭的实例：

八月十四日，……晚诣宗祠。明日秋祭，敬观陈设：中堂设香案，陈纸瓶一。问之，曰祭瓶。一香案，陈祭器数盘，……

十五日，四五人起，肃衣冠，诣宗祠。有顷，奏乐、参神、迎神三匝。主祭一人，副主祭一人，分献四人，执事八人，分立堂左右，行三献礼。由堂下至内寝，乐人随同升降，共十余次。祭时天色已明，行阖门礼，……

徽州的祠堂祭祖行“三献礼”，极为繁琐费时。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对祖先的虔诚。如今，潘家祠堂早已落寞荒凉了。我环顾四周，祠堂是三进五开间的合院建筑，高大厚实的外墙，包裹起一个重门叠院，阻隔了嘈杂喧阗的外部世界，营造出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文意象。外界的光线透过一方天井，静静地、柔和地宣泄在校榷舒展的银桂树上……

在我想来，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维系的焦点，而天井又是祠堂建筑中天地的象征，中庭所植必然是“一草一木总关情”。记得绩溪县上庄村胡氏祠堂的前院内，就生长着一棵树龄在二百年以上的罗汉松，据说，那是当年建造祠堂时胡适的先辈从歙县带土移植的。迄至今日，此树早已是古朴苍劲、枝繁叶茂了，村中族众虔诚地称之为“胡氏”，潜意识流露中显然凝聚着族人对血缘香火源流的追溯。由此看来，谁说草木无情？站在银桂树前，分明也让人滋生出一份历史的厚重。不是么？正对着银桂的就是祠堂的中心部分，以前是安放潘氏列祖列宗神主牌位的。遥想当年，每逢春露秋霜开祠致祭，

家族成员就沿着脚下的踏步鱼贯而上。在馨香俎豆的氤氲香火里，在先祖与后昆跨时空的心灵交流中，看着天井中馥郁芬芳的银桂，一定会从这树上分枝、枝上分权的婆娑树影间悟出些什么来……

徽州是中国家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世商业气氛最为浓烈的地区。而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宗族亲缘制度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同步的。这一点，并不仅仅限于徽州，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几个地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珠江三角洲），宗族反倒有了普遍的发展，这与人们通常的印象——商业的繁荣会逐步瓦解中国固有的家族组织的想法大相径庭。以徽州为例，在明清时期，一方面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但在另一方面，当地又是“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商业发展与宗族制度，呈现出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清代一首《黟山杂咏》诗这样写道：

祠堂高耸郁云烟，  
松柏苍苍不记年，  
最爱土风犹近古，  
苏公族谱范公田。

所谓苏公族谱范公田，是指北宋中叶苏洵和范仲淹对家族制度的悉心创设。苏洵所撰的《眉山苏氏族谱》，据说可算是近世家谱的最初样式；而范仲淹在其家乡平江（今苏州）广置义田，则使范氏族人“日有食，岁有衣”，举凡婚嫁丧葬，都可以得到义田的赈济。与此一脉相承，徽州的家族也纷纷捐置义田，扶孤恤贫，济急周乏；并建构祠宇，作为岁时俎豆之地。在当地，大族都有宗祠和香火堂。有的村落还不止有一个宗祠，除了总祠外，还有支祠和家祠。同一姓氏的直系亲属围绕着自己的“家祠”建造住宅，而“家祠”的建筑则环绕在“支祠”周围；“支祠”是同一姓氏、同一支脉繁衍的后代亲属所共建，它们簇拥于“宗祠”的周围；而“宗祠”则为同一姓氏的总祠。通过家祠、支祠、宗祠之间一层层的统属关系，徽州人的血缘组织呈现出宛如银桂般的枝枝桠桠——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

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通过开祠致祭和其他的家族活动，将族众牢固地纽结在同一祖宗的牌位之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血缘组织。直到今天，徽州同族人还常说，彼此原先是“同一个祠堂的”，实际上也就是指族众间的血缘关系。而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

在徽州，每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有一部以致数部家谱。对于当地人而言，任何一个人，只要问起他所属的支派，即使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一个家族经过数代的繁衍，人口压力很快地就超出了当地的生态承载能量，于是他们不得不东迁西徙，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大宗派生出小宗，而小宗又新派生出更小宗。在古代徽州，类似的派生过程几乎是亘古不断，历久弥新。其结果是使得聚族而居的大姓，尤其是汪、程二氏，支祠都以数千计。族大丁众的家族之家谱，如同他们的祠堂一样，也分为通谱、世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和小宗谱，等等，一姓一氏的谱乘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名宗右族纂修的族谱，刻工精美，卷帙浩繁。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一部题作“伊洛堂重镌”的《程氏宗

谱》，泛黄的扉页上，昔日曾涂抹过一层金黄的色调，这大概是族谱中相当罕见和考究的一类。如今，鲜艳的色彩已部分脱落，呈现出了乌黑斑驳的格调，给人以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然而，就在各种色调的交相映衬之下，其上赫然题有“源远流长”四个大字。翻阅这部古旧的族谱，我们在历涉波涛的中日贸易中，看到了程姓徽商的身影。他们和其他的中国人一起，即使是在殊方异域，也力图营造出故园的乡土氛围。于是，在日本的西端，人们可以看到徽州文献中经常可见的“福德正神”，正端坐在长崎的土地堂内；与此相互映衬的，则是福建会馆厅堂上高悬着的牌匾——“桑梓万里”。是啊，“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如果说见到家宅周围时常栽种的桑树与梓树，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故园。那么，当我见到福德正神之时，便情不自禁地改动了唐诗中的一个字——“乡神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众多源远流长的宗族血缘向外沿伸、扩大，就逐渐融合而成了地缘性的“乡土之链”，它将浪迹天涯的游子与心灵的故园，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 凄风苦雨中的贞节牌坊

黝黑的躯体，走过绵绵历史，如泣如诉地向我们走来。在残阳的映照下被染成微红，像陈旧的血迹。残阳如血，血凝残阳。

### ——灵

史书记载，东晋皇室司马晞每逢宴会，便令娼妓扮作新安人，载歌载舞演唱离别之辞，其声凄婉悲切。一般认为，新安人的“歌舞离别之辞”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早在公元四五世纪，徽州人就已经时常远出经商了。虽然，这种记载作为徽商的起源，或许仍有待确证。但其间感伤的气氛，却奠定了后世徽商以及徽州商人妇人格上的一种悲剧格调。

皖南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明清时期，山濠水聚的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当地甚至流传着“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这样的俗谚，说的就是徽州人的早婚——不少人往往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徽商方士 作有一首《新安竹枝词》，备述其中的劳顿艰辛：

健妇持家身作客，  
黑头直到白头回。  
儿孙长大不相识，  
反问老翁何处来。

少小离家远游、懋迁各地的徽商，历经霜风跋涉之劳，及至迟暮之年返回故里，长大了的儿孙有眼不识，竟至以“老翁”相称，其间的凄楚悲凉当可想见！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徽州地区极为普遍。徽州人在外经营，有“三年一归”的惯例，新婚离别，习为故常。有一首《黟山竹枝词》这样写道：

少小离家动别愁，杭州约伴又苏州。妾心难逐郎心去，折柳年年到白头。

“折柳”是赠别或送别的代称。徽州商人妇“折柳年年”直到悠悠白头，这绝非诗文的有意渲染。对此，胡适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对于徽州人而言，“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

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徽人不蹲家，经营走四方”，这既有利润的追逐，又实在是生活的无奈！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从此，相思有梦，芳华虚度。妇人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将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余钱，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住丈夫离家的岁月，称之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篋，所积之珠竟已达二十余颗之多！“记岁珠”这样的故事，或许是极端的例子，但在黄山白岳之间的这一方水土上，羁人离绪的无限遥情，似乎已积淀而为天籁地韵般的某种音律。

乾隆年间，徽州女子汪韞玉曾作《鹧鸪天·听雨》词：

松籁萧条烛影幽，雨声和漏到西楼。金炉香断三更梦，玉簟凉生五月秋。

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阻暗凝愁。疏帘到晓檐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

由此，人们仿佛看到，词中的女主人，或伫立楼头，望月长叹；或枯坐灯下，对影啜泣。烛影、雨声、金炉、玉簟，牵萦着重闺深闺中的每一缕思绪。另一位徽州女子程凤娥，也抒发了类似的情怀：

竟日湘帘慵卷，窗外已来新燕。双袖倚雕栏，日暖风和人倦。人倦，人倦，独上画楼消遣。（《如梦令·春闺》）

一点愁心指上弹，梅花羞带病中看，相怜早被湖山隔，空对孤灯带影残。情没绪，思无端，更深犹自倚朱栏，长空独有天边雁，为我勾留伴晓寒。（《鹧鸪天·有怀》）

思漫漫，恨漫漫，无限离愁指上弹，翠被怯春寒，对栏干，倚栏干，一纸家书仔细看，函露语平安。（《长相思·信至》）

最后的一首“长相思”，本是汉代诗中语。唐代文豪李白曾作同名诗，发出过“长相思，摧心肝”的感叹，在徽州，一些香闺淑媛，虽然身居芳园丽景，但面对窗外的满庭春色，落红飞舞，仰望那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滋生不已的相思情怀，却始终难以祛除——如此好景谁同？这般良宵谁共？这大概是徽州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悠悠愁绪。晚清词人汪渊、程淑夫妇合作《麝尘莲寸集》，以词集词，词中无一字无来处，却又按照严谨的格律，将之组成一首首新词。汪渊的《苏幕遮》曰：

柳供愁，花解语，总是销魂，总是销魂处。人自怜春春未去，芳草斜阳路。卧红茵，觞绿醕。几度相思，几度相思苦。明日重来须记取。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

程淑亦作有《苏幕遮》——

柳阴凉，兰棹举，南北东西，南北东西路。恰是去年今日去，芳草连天，芳草连天暮。似说相思，似说相思苦。梦断采云无觅处，门掩黄昏，门掩黄昏雨。

汪渊是休宁县商山村人，而商山在明清时代是徽州最为著名的商贾之乡。“歙县西溪南，抵不上休宁一商山”，这句蜚声远近的俗谚，说的是财聚力厚的西溪南，还不如休宁县商山村的殷富。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所撰《初刻拍案惊奇》中，就曾描写过休宁商山大财主——有百万家私的吴大郎，号称“吴百万”。然而，也就在这极负盛名的商贾之乡，许多陌上行客虽然腰缠万贯，但夫妻生活却如“风中柳絮水中萍，聚散两无情”。远隔天涯的有情人，你在山际，我于水涯，“天长路远魂飞苦”，于是，“相思”、“相思”、“相思苦”，这几个词在他们的笔端反复涌动，显然是对冷落孤寂的

---

以下引自吴小汀选辑《徽州词征》，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学研究会，约1990年出版。

引自郑惠、陈文《汪渊、程淑的〈麝尘莲寸集〉》，载《徽学通讯》第13、14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

心境所作出的真切写照。

或许是这种闺怨情愫的投映吧，徽派建筑中的飞来椅也就有了“美人靠”的俗称。

早在晚明时期，戏曲家汪廷讷在其故乡休宁县松萝山下，修建了一座私家庭园——环翠堂。后来据此绘刻而成的“徽派版画”代表作——《环翠堂风景图》，其中，就曾出现过路亭中的“美人靠”。显然，在此前后，这种叫做“美人靠”的建筑构件，已频繁出现在徽派建筑之中。徽州的许多建筑都是二层楼，楼上比楼下略高，楼檐外伸，楼层面临天井一周的弧形栏杆向外弯曲，临空悬置，俗称“美人靠”。美人靠，顾名思义就是供深闺中的妇女凭栏休憩之用的。徽州女子在此闲倚雕栏，或嫣然顾影，对月相思；或藉以遥望外部的世界，窥视楼下的过往宾客。

然而，高大厚实的外墙，毕竟隔断了老房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寂寂重门深院锁”，落寞的徽州妇女，清夜孤眠，每当夜幕降临，窗迎冷月，灯摇残照，一种孤寂之感油然而生。面对着空荡荡的深宅大院，她们有的靠解脱铜制的九连环聊以消愁破闷；有的则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白了乌黑的秀发。迨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

其实，徽州的妇女何尝都是用牺牲热情眷恋名教，以贞节来装饰男人的体面！？钱钟书曾引用清人施闰章《愚山诗集》卷二《枣枣曲》自序，说海阳（即休宁）有一种“香枣”，一般是将两颗枣子剝叠成，其中撒上茴香粉屑，再用蜂蜜浸渍。倘若探究它的来历，据说是由徽州商人妇发明用来寄给丈夫的，意思是“早早回乡”。也就是以“枣”与“茴香”的谐音，望夫早归。就这样，“留守女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着绵绵的情意和不尽的相思。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时分，我曾奔波在由歙县县城到深渡的公路上——这条道路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数百年后的我，虽然已无从体验他们彼时的心境，但在那个落雨纷纷的季节里，眼见着低山丘陵间参差隆起的坟冢，看着公路两旁小树上五颜六色的“挂钱”（徽州扫墓时的一种习俗），以及偶尔掠过窗外的一二只乌鸦，我也分明体味到作为异乡人的那份落寞和孤单！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微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的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茴香萝卜干”也作“茴香豆腐干”。流传于胡适故乡的一首民谣《写封信啊上徽州》这样唱道：

……………

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啊上徽州。

叫爷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伙头。

儿在外学生意，心中记住爹娘的话

“茴香豆腐干，不能自己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学好了生意我再上徽州。

天啊地啊老子娘啊，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

.....

商途险阻，不少人浪迹天涯，虽然归思时常萦回心绪，但却由于命运多舛，“没有出息”，只得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个清明时分，我曾到过歙县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当时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修，但见三进五开间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观裸露着一整面灰白色的山墙，在阴郁的天空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严严实实，见不到一扇小窗。走进祠堂，迎面扑来的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祠堂虽然空旷而残破，但内心的震撼却异常强烈——在对女人贞节的表彰中，我读到了男人的一种恐惧！.....

这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一段记忆。上小学时，每天都要从一座牌坊下走过。这是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竖立的“节烈”牌坊，当然没有在徽州见到的那么富丽堂皇。每次走过牌坊，我从来不曾产生过什么特殊的感觉。后来读到乡贤林纾的《畏庐琐记》，才知道贞节牌坊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故事：

闺中少妇丧夫，不能存活，则遍告之亲戚，言将以某日自裁，而为之亲戚者，亦引为荣，则鸠资为之治棺。前三日，彩舆鼓吹，如迎神人。少妇冠帔袞服，端坐舆中，游历坊市，观者如堵，有力者设宴饮之，少妇手鲜花一束，凡少年之未诞子者，则就其手中乞花，用为生子之兆。三日游宴既尽，当路结彩棚，悬彩绳其上，少妇辞别亲戚，慨然登台，履小凳，以颈就绳而歿，万众拍手称美。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闺中的少妇似乎是心甘情愿地为礼教献身，但我们透过历史文献看到的事实却不尽然。在徽州，对于再嫁的妇人，人们总是以歧视的眼光相看。例如，她们出嫁时不得走正门，轿子不能靠近宅院，只能“穴墙乞路，跌足蒙头”，无知的儿童对她们鼓掌起哄，甚至于投掷瓦石。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社会的压力促使更多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礼教的束缚。

篁墩小镇有一座巍峨壮观的“程朱阙里”牌坊，据江忠侔《新安景物约编》说，篁墩富山麓是程、朱二氏的祖居所在，清朝曾赐祠额曰“洛闽渊源”。由于篁墩是徽州士族的发祥地，后人遂以“程朱阙里”作为徽州的代称。这倒是名符其实的一种称呼！因为在徽州，程朱理学的影响当然较之福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人赵吉士说过：“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这或许不是过甚其辞的说法。吴敬梓《儒林外史》小说中，就有“徽州府烈妇殉夫”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心态和民风土习——徽州秀才王玉辉三女婿病重不治而歿，女儿哭得天愁地惨，候着丈夫入过殓，出来拜见公婆。和父亲道：“父亲在上，我是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王玉辉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这竟是这样做罢。.....”

数日后的二更天气，三姑娘去世的噩耗传来，老孺人（王玉辉之妻）听见，哭得昏死过去，灌醒回来，仍大哭不止。王玉辉却走到床边说道：

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得好，只

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因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而他的朋友也都称赞王玉辉“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于是，定制了木主摆入祠堂，并在门首建了牌坊。……

从徽州的文献来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小说家流的杜撰。我们翻开徽州的方志、族谱和其他资料，处处可见类似于“程烈女”、“汪贞女”、“鲍烈妇”之类的记载。“婆媳同孀”、“三世苦节”、“未嫁守寡”、“夫亡投井”和“殉夫自缢”等，更是触目皆是。

在歙县，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嫁到檀模、檀樾，饿死也情愿。”檀模、檀樾也就是唐模和棠樾，这两处都是明清时代商贾辈出的村落，更是清代众多盐商巨擘的桑梓所在。“歙是富贵乡”的说法，主要指的就是唐模与棠樾所在的歙西盆地。这句俗谚固然是说歙西一带生活条件优越，吃穿不愁，但如果我们联系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来考察，那么，富裕商贾对徽州社会礼教的重新规范，便无疑显得更为强烈。根据苏州大学唐力行教授的研究，民国《歙县志》中的人物志共九卷，烈女传竟有四卷，几乎占到一半。烈女人数从唐代到明清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清代烈女数是明代的四倍多，而在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显然，烈女数的增长与明中叶徽商势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时代徽商的鼎盛息息相关。以淮扬盐商为例，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在扬州一带提风倡雅，文酒聚会，质疑访学，纷纷以儒饰贾（以儒家伦理重新包装自己），以期跻身于绅商阶层；而在徽州，他们则殚精竭虑地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营造出“程朱阙里”那样的理教重镇。

于是，我们在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的故里——棠樾，看到了矗立着的一组石牌坊群。这七座逶迤成群的石牌坊，位于该村村口的东北部，纵向跨甬道而立。它们自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分别为：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节孝坊、慈孝里坊和鲍灿孝行坊。其中，便有二座是贞节牌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柱冲天式，枋额上镌有“节劲三冬”和“脉存一线”等字样。这是为了表彰文渊继妻吴氏事病姑尽礼，守节逾六旬而建。而鲍文龄妻节孝坊则建于稍早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亦为四柱冲天式，石坊枋额上书写着“矢贞全孝”和“立节完孤”。它是为了表彰文龄之妻汪氏年二十五守节，一直到四十五岁卒年为止。

据说，单单是歙县一地就有约六千座的祠堂，但不清楚贞节牌坊究竟有多少。然而，任何一个到访过徽州的人都不难发现，贞节牌坊几乎是随处可见。看到这些“黝黑的躯体”，听到隐藏于牌坊背后的那一段段凄婉悲切的故事，大概什么人都会无动于衷吧！一位女性曾以独特的细腻笔调，记叙了她的观感——

宋明两代遗留下来的牌坊有几十座，孤独立在漠漠原野上，夕阳将它们黝黑的身躯染成微红，看起来像陈旧的血迹。我下了车，抚摸这些被岁月侵蚀了的牌坊，耳边仿佛有嚤嚤的哭泣声。……

阳光消失了，女人啼哭之声似乎更凄厉，我毛骨悚然，不由加快脚步离开这些牌坊。（舒菲：《贞节牌坊》）

